

党史视角下的现代化征程

□ 梅丽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了“两个15年”，即新的“两步走”的顶层设计。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重大战略安排，完整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使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现代化之梦，通过共产党人的代际接力一步步变成现实。

（一）

近代以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之一，在中国人的最初设想中，工业化就是现代化的代名词。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基本任务，反映了中国人民100多年来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确判断我国的主要矛盾，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相应地，四个现代化任务也被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1964年12月，在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惧西方大国的封锁和威胁，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打下初步的基础，而且取得了以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为标志的一批重要成果。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把四个现代化具体化为“小康之家”，并称之为“中国式的现代化”。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正式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应地，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在沿用四个现代化即侧重于物质文明的同时，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

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设想具体化，即“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在邓小平的设想中，小康社会这一“中国式的现代化”，只是中国由温饱型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又构想了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战略构想随后被写进党的十三大报告之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目标。这样，现代化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目标。至2000年，“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提前胜利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设

计的“三步走”战略，对第三步只作了一个大致的构想。在走完前两步目标的时候，需要把第三步目标和步骤进一步具体化。为此，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并首次把“社会更加和谐”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目标包括：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以及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等目标。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把实现指标修改为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增加了“人均”两个字，并对实现这一目标增加了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等更高要求。同时，对

现代化的内涵又进行了拓展，加上了“和谐”两个字，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指标修改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增加了“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要求；在重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同时，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进一步拓展为“五位一体”，增加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更加协调。

（四）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大既要明确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战略重点，也要对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进行战略谋划。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

钱学森是享誉中外的科学家，是我国“两弹一星”的主要奠基者、开拓者和组织者，一生获得的荣誉可谓数不胜数，但在诸多荣誉中，他最看重的、也是最令他激动的只有一项——“优秀共产党员”。

“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表彰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他应邀发表讲话：“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简单、朴素的话语中洋溢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和喜悦，充满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与忠诚。钱学森用一生的实践，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行动，展现了“优秀共产党员”的胸怀与作为，诠释了“优秀共产党员”的真正内涵。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钱学森早年留学美国，功成名就，曾有评价“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但他始终牵挂着灾难深重的祖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看到了希望，客居美国的他心潮澎湃，决定放弃一切，立即回国。他激动地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报效祖国了。”历经磨难，终于在1955年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民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使钱学森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凝聚力和领导力，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旧面貌，心中开始产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强烈愿望。经过慎重考虑，1958年初，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成为预备党员，并于同年11月12日转正。多年夙愿终于实现，他非常高兴，也很激动，从此以后，党员标准、党性原则就成了他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从来没有放松过。

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却偏

偏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窘迫起来。尽管如此，党和国家还是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保证科技人员的生活供应。聂荣臻元帅还时不时地送一些猪肉，交待要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到钱学森实在太劳累了，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不料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马上就像换了一个人，态度严厉地批评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居然让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后来，他又把自己刚刚出版的两部科学著作的稿费，一分不留，全部交了党费，下定决心，与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他有一句名言“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至今读起来，仍是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令人感慨万千、肃然起敬！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已经入党了，即使按照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他也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但是，他认为还不够，这只是形式上的入党，关键是思想上也要入党。所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国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他的工作的帮助时，由衷地赞叹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愧为人类智慧的源泉！”可见，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是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而且领悟了真谛，做到了学以致用、活学活用。难怪，他最珍视的荣誉是“优秀共产党员”，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人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然应该感到自豪和光荣。

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钱学森真正发挥了共产党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一回国，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无论困难多大、条件多苦，从不叫苦叫累，总是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变不可能为可能，最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他和他的同事们当年所做的一切，奠定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根基，怎么称赞都不为过。即便到了晚年，他仍然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征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跃迁，也使党和国家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按照十九大新的战略安排，再过3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将转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较之过去提出的奋斗目标提前了15年；原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调整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被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原来的“国家”改成了“强国”，且不再提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指标。这不仅提升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也使现代化建设目标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有了更好的对接。这样，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上分成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到1990年主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阶段，1991年到2000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阶段，2001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四阶段，2021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五阶段，2036年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理论解读

『优秀共产党员』 钱学森最看重的荣誉

□ 李建波

在关心、思考一些事关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大事。比如，2005年，中央领导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针对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思、改进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被提上议事日程。经过这么多年不懈的努力，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有些领域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这应该就是钱学森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他的远见卓识。

纵观钱学森波澜壮阔、成就卓著的一生，尤其是回国入党以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确实做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确实无愧于“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曾经满怀深情地讲过的一段话，或许就是最好的注脚：“我作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满意的话，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党史人物

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

□ 刘国成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从从严治党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蔓延，贪污腐败现象时有发生；随着党员数量尤其是农民党员数量的增加，又出现了“不要组织纪律”这种漠视纪律规矩之事；再加上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残留着官僚主义遗毒，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鱼水情深的党群干群关系。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党进行了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紧紧抓住党员干部这一关键，从各个方面全领域进行从严治党实践。

在思想上，通过教育从严要求党员干部，把干部教育特别是在在职干部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第一位。为此，我们党创办了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30多所干部学校，还专门制定了在职干部教育实施的相关法案，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组织机构、科目编制、制度奖惩、考试检查以及教员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在课程方面规定要以马列主义为主要讲授内容，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深入学校指导办学工作，还经常讲课，毛泽东为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唯物论”，后来成为《实践论》《矛盾论》的主要部分，其他中央领导也经常上讲台当教员，这使得党员干部逐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坚定了理想信念。

在制度上，通过制定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制度设计，以此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当时，虽然我们党处在战火纷飞和经济困难的环境下，但仍然不遗余力地建立健全制度建设，先后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以及刑事、民事、廉政、司法等具体法律法规，建立了严格的干部管理制度，实行了统一的财政经济制度，从而有效地扎紧了制度笼子，发挥了严格的制约作用。

在监督上，我们党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督体制，包括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五位一体”的监督体系。早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就曾说：党员干部“要互相监督，监督的紧就谨慎，就觉悟。监督的越紧，觉悟程度也越高。”可见，我们党很早就认识到了监督的重要性。进入延安时期，我们党更加注重发挥监督作用，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民主选举，充分调动了李鼎铭等民主人士的参政积极性，实行了以“三三制”为主的民主监督，使得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处于三分之二之二的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监督之下，这就使得共产党员更加注意自身的工作和言行，保持廉洁奉公，否则，就会受到批评、检举甚至弹劾，充分发挥了监督的效能。

在反腐上，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时刻不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并对出现的腐败分子严惩不贷，毫不手软。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克功案和萧玉璧案。黄克功是一位资历老、功劳大的高级干部，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而沦为杀人犯。党没有因此让其“戴罪立功”，最终被判处死刑。萧玉璧也是一位有功的战斗英雄，但他无视党纪法律，贪污公款3050元（法币），被执行枪决。所以说作为党员干部，不论功劳有多大、职务有多高，只要贪污腐败了，就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这正如当时胡耀邦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所说：“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能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这也说明我们党历来都是从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

在作风上，我们党严把作风关，实行领导带头，率先垂范，以保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比如在上生活上，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穿的都是布衣服，吃的都是小米饭，住的都是土窑洞，从不搞特殊化。在工作上，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的领袖们更是时时事事处处带头示范，毛泽东点灯的煤油总是省了又省，一个旧信

封正反面写了又写；朱德天不亮就背起粪筐去拾粪，穿得极其朴素，所以续范亭写诗赞道：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自己的床头订好了生产节约计划，并身体力行，利用一切时间予以践行。可见，当时的延安，我们党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党员真正践行了：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并且带头勤恳工作，廉洁从政，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充分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从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来看，体现了“全”和“严”两个字，构筑起了从严治党的铜墙铁壁，使陕甘宁边区“十没有”，边区政府也被人民群众称赞为“模范政府”，为今天我们党治国理政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第一，要把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共同理想，从而补足理想信念之“钙”。第二，要扎紧织密制度的笼子，创新体制机制，防止个别党员干部钻空子耍性子，公权私用最终导致权力欲膨胀，走上违法犯罪之路。第三，要持续不断地反腐倡廉，避免一阵风，继而形成强大的反腐震慑力，使腐败分子无处遁形，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第四，要聚焦作风建设，把党员干部的作风当作大事来抓，纠正存在的不正之风，使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真正起到示范作用，成为争相学习的好榜样。第五，要锻造监督利剑，做到事前有预防，事中有检查，事后有巡视，覆盖党的各项事业各个领域，造就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只有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党，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才有坚实保障。

以史为鉴